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
2004年6月，頁215~259

BIBLID1012-8514(2004)33p.215-259
2004.2.11收稿，2004.4.1通過刊登

日本機密檔案中的伍廷芳*

孔 祥 吉　村 田 雄 二 郎**

提　要

伍廷芳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以往的研究，忽視了伍氏與日本之關係。本文採用日本外交檔案中原始記錄，揭示了伍廷芳研究中被人們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早在甲午戰爭中，伍廷芳作為《馬關條約》談判的頭等參贊，開始與日本方面有較多接觸。回國後，伍氏又向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及駐京公使林董，多次提供清廷上層不同政治派別對和戰的態度，以及彼此間的矛盾與裂痕等情報，並對中國前途悲觀失望，以為中國會四分五裂，走向滅亡。伍廷芳還試圖藉日本戰後之威力來恢復李鴻章在戰爭中失去的權力和地位。公然聲稱，如果李鴻章能繼續有所作為「實彼我之幸福，兩國之大利也」。爾後，伍廷芳由美國出使歸來，又再度向駐京公使內田康哉泄露清廷內部政要秘聞，揭露了清廷內部長期存在著一個親俄黨，聯芳即其代表人物，以及光緒皇帝生前之危險處境，並試圖要日本公使及夫人向慈禧進言，勸慈禧拔擢伍氏等到關鍵崗位等。

日本檔案中所保留的這些情報在今天看來，似乎已是人們共知的情事，而在當時日本外交官卻對此類情報極為重視，他們都將伍氏談話認真整理後系統向外務大臣報告，然後，外務省又將它們大多呈送給總理大臣過目。

本文具體分析了伍廷芳向日本提供情報的原因，主要是受李鴻章等人政策之影響，以及伍氏本人對封建制度的厭惡和對日本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所致。本文揭示日本機密檔案中這些罕為人知的史料，不是要否定其歷史功績，而是希望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上這個重要歷史人物。

關鍵詞：伍廷芳　外交　中日關係　情報　革命家　內田康哉　荒川巳次　林董公使

---

* 本文係東京大學地域文化科晚清史與檔案研討班的講授課題之一，有孫偉珍、佐藤隆、小野寺史郎、林文賢、上原尚大、大橋義武等多位學員參加了翻譯與討論。

** 孔祥吉，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東京大學大學院地域文化研究客座教授；村田雄二郎，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助教授。

一、封建朝廷裏的洋律師
二、伍廷芳與日本的早期接觸
三、《馬關條約》簽訂後與日本駐天津領事的接觸
四、在北京與林董公使之密談
五、首次與內田康哉密談
六、再訪內田康哉
七、三訪內田康哉
八、轉向革命
九、對伍廷芳的歷史評說

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尚處於新舊交替，內外交困的混亂局面，北方軍閥弄權，南方人心離散。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矢志不移，堅定北伐，並且將軍政府的大本營遷至廣東韶關。此時，因為廣東省長陳炯明倒行逆施，阻撓北伐，故孫中山將其免職，而重新任命一位年逾八旬的堅定支持者兼任廣東省長要職。陳炯明心懷怨恨，六月十六日公然嗾使其部將叛變，攻擊觀音山之總統府。這位接替其省長職位之長者，蒿目時艱，悲憤填膺，竟於六月二十三日在廣州遽爾仙逝。孫中山聞訊悲痛，稱頌這位長者曰：

> 能於危疑震撼之際，泰然不易其所守，自以與於締造民國之役，不忍見為武人政客所敗壞，故以耄耋之年，當國事犯危難無所恤，卒以身殉。[1]

孫中山滿懷激情所稱頌的長者，不是別人，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伍廷芳。

其實，伍廷芳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可謂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丁賢俊、喻作鳳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搜集大量海內外史料，輯成《伍廷芳集》，由中華書局於一九九一年出版。該書搜集了伍廷芳的大量文稿。此外，香港大學的張雲樵博士亦對伍廷芳進行長期研究，指出伍氏「不

1 羅明等主編，《清代人物傳稿》（瀋陽：遼寧人民，1992），下編，卷 7，280。

論求學及服務香港時期，或北上從政時期，都可看到他那種奮勵創拓的精神，正義凜然的人格，和藹然沖挹的風儀。」[2]他認為「伍廷芳博士為清末外交史上及民初政壇上的傑出人物，他也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英雄。這是凡閱讀中國近代史的人，無不同表景仰，而深致惋惜的！」[3]張先生窮數年之力，搜羅了大量的有關伍廷芳之中外文資料，撰寫了《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廣征博引，深入分析，獲得了很大成功。當然，除了張博士之外，還有不少中外史學家分別對伍廷芳從不同方面進行過研究，故稱伍廷芳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卻都忽略了一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不十分重要的問題，即伍廷芳與日本之關係。這實在是一個不應有的疏忽。

日本外交檔案顯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員接觸時，伍廷芳多次稱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因此他非常珍視這份友誼。既然是朋友，就應該推心置腹，因此，伍廷芳在與日人交談中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清廷內部政要秘聞。但是，日本的外交官們在與伍氏打交道時，卻與伍氏態度大有不同。他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外交官的職責，表面上他們也稱伍氏為朋友，可是，他們似乎並未把伍氏視作真正的友人，而是把他看作是提供重要情報的來源。正因為如此，每當伍廷芳的談話結束以後，這些公使、領事們都要將其內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務省稟報，以供上層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參酌。其次數之繁多，內容之重要，實在使人驚訝不已。

然而，作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我們一直是把伍廷芳作為一個清末傑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孫中山對伍廷芳更是推崇備至。

其實，友誼、情報、革命家，都是伍廷芳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的生命長河中不同色彩、不同側面的表現。「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歷史人物本來就是紛繁複雜、多彩多姿的，我們何必非要把他簡單化呢？

---

2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臺北：聯經，1987），扉頁。

3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自序。

本文揭示日本機密檔案中這些重要原始史料，並予以考證分析，其目的不是要否定伍廷芳的歷史功績，而是希望全面地正確地瞭解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一、封建朝廷裏的洋律師

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漫長歷史中，皇帝任命的重要官吏，何止成百上千，但是，卻沒有一個系統受過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憑，然後在香港又從事多年本職工作的律師。唯一的例外，就是伍廷芳。因此，釐清伍廷芳的成長過程，對於瞭解伍氏後來同日本的複雜交往是必不可少的。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號秩庸，原籍廣東新會人，生於南洋，其父伍榮彰在當地經商。三歲時隨其父返回廣州，居住於廣州市芳村，且由當地塾師講授傳統學問，尚未及考試，兩廣地區就爆發了以洪秀全領導的起義運動。局面動蕩，課業中輟。後來伍氏得香港之親友及外國傳教士相助，轉赴香港求學。從咸豐六年（1856）到咸豐十一年（1861），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畢業後曾在該地高等審判廳擔任譯員，同治八年（1869）又改任香港地方審判廳譯員。[4]

但是，對於志存高遠，抱負宏大的伍廷芳來說，他是不甘於只作譯員工作的。他於同治十三年（1874）用平日所積累的薪俸，轉赴英倫，自費留學，進入倫敦林肯法律學院，奮發圖強，刻苦攻讀西方法律知識。倫敦林肯法律學院「是當時西方社會培育青年紳士的搖籃。至於華人社會攻讀西方法律者則未之前聞。」[5]兩年後伍廷芳由該校畢業，並通過專門考試，取得律師證書，且以通曉商務刑名、中外律例、萬國公法而聞名於當時。

光緒三年（1877）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的伍廷芳又返回闊別多年的香

4 羅明等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 7，273。

5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1。

港，而軒尼詩爵士（Sir Hennessy, John Pope）亦於同年前來香港就任第八屆香港總督之職，且對伍廷芳信任有加，於一八七八年推薦伍廷芳為掌法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此舉「為全港華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榮。雖然香港是一個絕大多數華人的社會，但當時只有歐洲特出的人士才有資格被委任為太平紳士，而伍氏則是一八四二年香港開埠以來，第一位華人獲得該項榮譽的。這是港府對服務社會有卓越貢獻人士的褒揚。」[6]

光緒六年（1880）伍廷芳又被聘任為香港定例局（今稱立法局）議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而且這是港英當局「將最高立法機構首次向華人作有限度的開放，其重要性固不止於容許華人參與立法而已，而是克服了英國政府多次的拒絕和恐懼華人參政的難關。雖然軒督的推薦很重要，但只有具備了伍氏這樣條件的人，才能使軒督的努力獲得成功。」[7]這實際上是開了華人進入香港最高立法機構的先河，實在意義深遠。

伍廷芳參加了當時許多香港法律變革的活動，諸如廢除笞刑等，使在倫敦學到的法律知識得到了實踐，開拓了見識，增長了才幹。

隨著伍廷芳的聲名遠播，郭嵩燾等駐外公使都曾經希望得到他的幫助。身居內政外交要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對伍氏極為信服，早在光緒三年（1877）李鴻章即向朝廷上書希望招致伍氏到北洋任職。其文曰：

> 近日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前擬通商律例，迄未議辦。泰西各國欺我不諳西律，遇事狡賴，無理取鬧。折之以中國律例，則彼諉為不知，悍然不顧。思有以折服之，非得一熟諳西律之人不可，顧物色數年，未得其人。
>
> 日昨津海關道黎兆棠帶粵人伍廷芳來見。久聞其人熟習西洋律例，曾在英國學館考取上等，於其來謁，虛衷詢訪，俱能指陳款要。雖住香港及外國多年，尚恂恂然有儒士風，絕無外洋習氣，尤為難得。

6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2。

7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3。

> 前出使英、美之郭侍郎、陳太常爭欲羅致之，蓋有由矣。此等熟諳西律之人，南北洋需酌用一二人，遇有疑難案件，俾與洋人辯論。凡折以中國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謂以彼之矛刺彼之盾也。[8]

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李鴻章愈來愈覺得伍廷芳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伍廷芳亦認為回國服務可以大有展布，施展自己的遠大抱負。於是，伍廷芳於光緒八年（1882）告別了他生活多年的香港，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他乘輪北上，在上海小作停留後，即到北洋大臣李鴻章那裏就職。

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諳熟西方法律而被直隸總督李鴻章安排進入幕府，協助李鴻章興鐵路，開礦藏，並充當翻譯，處理與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與稱讚，成為北洋通商衙門最通達外情的幕僚，因而很快得到提升。甲午戰爭期間以候補道而充頭等參贊官，先後隨張蔭桓、李鴻章兩度赴馬關參加中日議和談判，頗露頭角，故而在甲午戰爭結束後，即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被任命為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等國大臣。光緒二十八年（1902）回國後曾任外務部右侍郎，會辦商務大臣，並與沈家本一起被命為修訂法律大臣。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再度充任駐美國、秘魯、墨西哥、古巴等國公使，一年多後歸國。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光復，伍廷芳投身革命，與陳其美、張謇一起組織共和統一會，不久被推舉為南方革命派代表與清廷和袁世凱方面的代表唐紹儀舉行會談，此後，又在南京臨時政府出任司法總長等職務，參加了由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活動。

二、伍廷芳與日本的早期接觸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記載，伍廷芳與日本外交人員的接觸是光緒十一年（1885），天津條約談判之際。之後，他還參加過處理長崎事件。然

8 丁賢俊等編，《伍廷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上冊，1~2。

而，他與日本官員的較多個人接觸，則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第一次馬關議和之時。當時，伍廷芳作為頭等參贊隨同張蔭桓、邵友濂赴馬關議和。日本以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與外相陸奧宗光為議和全權大臣。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1895年2月1日）雙方在廣島縣廳互相核閱全權證書。日方以張、邵二人並非全權大臣，不具議和之條件，並於次日在廣島縣廳見面時，宣佈拒絕開議，並不允中國使臣駐紮。但是，在清廷議和大臣離開會談場所廣島縣廳之際，伊藤博文又留下伍廷芳，與伍氏進行交談，此次談話內容十分重要。據《伍廷芳與伊藤博文問答》記載：

>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隨同張大人、邵大人往廣島縣廳，晤日本大臣伊藤、陸奧。會議畢，各位均回寓，伊藤執廷芳手留坐良久。伊藤云：你們到敝國，商議無成，甚為可惜。你回貴國時，請代問候李中堂，他身體尚康健否？
>
> 答以：託福，甚好；然位尊事多，未免昕夕勤勞，不遑啟處。回津必當轉稟。
>
> 伊藤又云：如貴國誠意欲和，再派員商議，必須給予切實全權字據；你熟諳公法，你們大臣所帶之敕書，何以不照向章格式？
>
> 答以：頒發敕書時，廷芳尚在天津，不在北京。
>
> 伊藤又云：若再欲議和，愈速愈好。如不欲再來廣島亦可。
>
> 廷芳問：在上海會商可乎？
>
> 伊藤答以：上海非會商之地。
>
> 又問：香港可乎？
>
> 答以：亦不宜。
>
> 又問：依貴大臣意見，然則何處合宜乎？
>
> 伊藤思想半晌方答云：旅順口或可，屆時再定。
>
> 廷芳云：頃聞貴大臣所讀之說帖，有云中國再派大員，必須聲明位望等語。然則，暗指現派二位大臣非位望者乎？
>
> 伊答：非也，我不過泛說耳。乙酉年，因朝鮮事，我往中國，即晉

京，得有中國予李中堂全權字據，方允回津與李中堂會議。此次中國無論派何員商議，必須執有切實全權便宜行事字據，而無含糊語句方允會商，蓋我所議各事，必定照辦，斷不反悔。

初九日午後，因奉張大人、邵大人諭，往伊藤寓面交公文一件。寒暄畢，伊藤云：你們此次遠涉而來，不能辦事，非敝國之過也。中國為何不頒發全權敕書？以吾觀之，中國之意，只欲打聽敝國索款，非有真心議和也。

廷芳答以：貴大臣想差矣。此次我們來，實欲議和。如係假意，何必派倆位大臣，奏帶參贊、隨員等，鄭重其事，跋涉重洋，所費實多。即此具見誠心實據。請貴大臣勿聽外間浮議，疑中國非實意也。

伊藤問：中國既有實意，何以不給切實全權？

答以：中國給全權事，向所罕見。今張大人、邵大人帶來國書、敕書，照我中國觀之，係有全權辦事。

伊藤又云：敕書內並未予定約畫押之權。即此已見全權之不足。

答以：照我們觀之，既有商議之權，即能定約畫押。如有疑竇，我們大臣可電奏請旨，以釋疑心。今貴大臣竟不開議，未免過於拘泥。

伊曰：此是兩國最大之事，必須照公法辦理。設或稍有瑕疵，為各國所笑。咸豐戊午年，英國額公使與桂、花二大臣訂約後，復又失和。前車可鑒，故此次不能不格外慎重。譬如一人欲買物，必先備銀兩方可交易。今全權即銀兩也，無全權，豈能開議。

答以：凡賣物，亦必先以價值告人，以便議價備銀。今貴國所欲，秘而不言，不知何意。惟終不能久秘，何不及早明言，俾中國知貴國所欲，設法了結，以免兵事纏綿，兩家勞民傷財也。

伊曰：你所說甚是。吾非不願告知。惟此係國家秘密要事，俟貴大員果有切實全權方可說出。貴國何不添派恭親王或李中堂同來會議，鄭重其事。

答以：恭親王與李中堂均有緊要職任，一時恐走不開。張大人、邵

> 大人均係中國大臣，聖眷甚隆，特派來議和，亦是一樣。
>
> 伊云：我不嫌張大人、邵大人，惟此事最重，更添一爵位最崇之人會同定議，肩能負重，可期速成。然亦不論添派與否，但最要係全權辦理之敕書，切實悉依公法款式。
>
> 廷芳云：照公法給予全權，原欲便宜行事。惟近來各國設有電線，即使西國有事，派全權大臣與別國會議，而亦隨時電達本國政府。中國敕書如即照貴大臣所交敕書式樣可乎？
>
> 伊答以：如照此樣則合也。貴國素以日本窮小，殊不知自開仗以來，並未向外國借貸，所需兵費均由本國自籌。已與本國商民商借一萬萬元，並又擬借五千萬元。日本所費兵餉，較諸貴國業已數倍。現在兵攻威海衛，南邊一帶已得，但海面及劉公島各炮臺現尚鏖戰，勝負未分，大約指日可全取。軍情萬變，時刻不同，早和為宜。至會議之所，或在旅順，或在別處，屆時可托美使代商。[9]

由上所述可知，伍廷芳在廣島與伊藤博文分別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初九日（1895年2月2日、3日）有兩次私下會談的機會。伍廷芳已將伊藤博文的這次談話內容向清廷奏報。但是，我們相信這只是他們交談的主要內容，而不是全部。其中有關伊藤博文與伍廷芳敘述天津分別後的問候和聯絡情感，甚至伊藤博文對伍氏誇獎的話，伍廷芳已經隱瞞。然而，對伊藤博文的這種做法本身，以前是很少予以懷疑的。伊藤博文作為日本首相，為什麼偏偏找伍廷芳這樣一個小人物談話呢？

張雲樵先生認為：因為伍博士的才能出眾，「頗為敵國首相的敬重」。[10]並進一步對此事進行分析道：

> 伊、陸對張、邵在會議上的陳詞，是以中國敕書不合國際公法為藉口，拒絕和平談判。這一切不過是官樣文章，難知對方的真實意向，肆應較費周章。好在伊、伍是同時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彼此交談，比較不拘形跡。雖然張、邵的任務失敗了，但伊、伍的問答頗

9 丁賢俊等編，《伍廷芳集》，上冊，11~13。

10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自序。

> 為有用。伍氏從此不只為朝廷所倚重，同時也為中外傳播媒介眾所周知的外交幹才了。[11]

其實，這種分析是很值得推敲的。首先，按照國際談判的慣例，伊藤博文如果有事想通知清廷，完全可以在與張蔭桓見面時表達日方的意見，因為張、邵二人乃清廷之正式談判大臣。而伊藤博文卻繞過張、邵二人，找到一個談判的參贊官，面談如此重要之事，這實在是一件違背外交常規的事。

其次，伊藤博文與伍廷芳個人交談的原因，是否如張雲樵先生所分析的，因為「伊、伍是同時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故而找伍廷芳交談。這一論斷也很值得懷疑。張先生的依據的是《傅秉常先生訪問記錄》第六十三頁的記載。然而，傅秉常的訪問記錄，是否反映歷史真實，張雲樵先生引用時並未予以考證。一般說來，筆者相信檔案記錄，而對口述回憶史料，則未敢全信。因為在日本檔案或中國檔案中，實在找不到伊、伍是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的任何記載。至於坊間所依據的《傅秉常先生訪問記錄》的記載，今再予以考證如下：

傅秉常，祖籍廣東南海，生於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四日（1896年2月16日）。十歲隨伯父赴香港求學，一九一二年入香港大學，主修工程，一九一六年以一等榮譽成績畢業。兩年後，由何啟之子何永乾的關係，認識在廣州軍政府任職之伍廷芳，並由伍氏介紹出任軍政府總務廳印鑄科長；後隨伍廷芳赴滬，任事於上海滬杭鐵路局，半年後轉任伍之秘書。[12]由上述傅秉常之經歷可以看出，他同伍廷芳之關係相當密切，故對伍生平事跡瞭解甚多。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傅秉常在訪問記錄中所述伊藤博文與伍廷芳「是同時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卻有令人難以置信處。查伊藤博文赴英留學時間，據《伊藤博文公年譜》，在天津談判前共有三次赴英記載：

第一次係文久三年（1863）五月十二日橫濱出發，經由上海，於九

11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127。

12 秦孝儀等編，《中國現代史辭典》（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443。

月二十三日抵達倫敦。不久即聞英、美、法、荷四國艦隊將炮擊下關之消息，立即返回國內，時間為元治元年（1864）三月中旬倫敦發，六月十日抵達橫濱。[13]

第二次係一八七一年曾隨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考察，再度在英倫短暫逗留，抵達英倫時間為一八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六日離開倫敦前往巴黎。[14]

第三次又於一八八三年三月三日曾到達倫敦訪問，五月二日由倫敦再往巴黎。[15]

而伍廷芳之赴英留學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到光緒三年（1877）。由此可見，所謂傅秉常之「是同時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之說，實在無法成立。

事實上，伊藤博文與伍廷芳相識並非在倫敦，而是在中國天津。據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館擔任書記官長達數十年之久的中島雄記載，伊藤博文與伍廷芳最初相識是在光緒十一年（1885）的天津談判之際。[16]又據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傳》記述，一八九五年二月二日，日方拒絕談判後，伊藤留住伍廷芳講了清國沒有遵守國際公法之後，專門談到「這些是因我與足下自天津以來的舊交才在此說上一句的」，伍聽了這話後先表示了感激，然後繼續交談。[17]

伍廷芳後來告訴日本駐京公使，正是伊藤博文的這次談話，給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內心深處產生了對日本的許多好感。這種情感一直延續到十多年之後，亦未曾衰減。[18]伊藤博文將如此重要的資訊交給伍廷芳轉達，實在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此事在伍廷芳日後同

13 春畝公追頌會編，《伊藤博文公年譜》（東京：春畝公追頌會，1942），19。

14 同上書，71~73。

15 同上書，155~156。以上三注文均由馮青翻譯。

16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清交際史提要》，編號1－1－2－54。

17 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傳》（東京：原書房，1970複刻昭和18年原本）（下），頁160~162。

18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內田康哉致小村壽太郎與伍廷芳密談件》，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譯者孫偉珍。參閱本文第五節「首次與內田康哉密談」。

日本的交涉中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故不可不考證清楚。

三、《馬關條約》簽訂後與日本駐天津領事的接觸

在張蔭桓、邵友濂赴日議和被拒之後，清廷根據伍廷芳所轉達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鴻章為欽命全權大臣，再次赴馬關議和。伍廷芳與羅豐祿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均被任命為頭等參贊同赴日本。伍、羅二人是當時中國最通達外情，最瞭解西學的官員，羅豐祿係當時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故處理中國與日本談判這樣的大事，李鴻章除了讓自己的兒子李經芳陪同之外，自然離不了這兩位頭等參贊[19]。

李鴻章一行在日本反復辯駁，屢經磋商，終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後，伍廷芳又被任命為中國方面的換約代表。所謂「換約」，是將在馬關簽訂之約，經過各自政府批准用印後，再拿到煙臺與日本代表互換條約文本。此後，李鴻章又擔任了商約談判大臣，為貫徹《馬關條約》的有關內容，與日本政府的代表展開了中日商約談判。

《馬關條約》的內容十分苛刻，包括賠鉅款，割臺灣，增開商埠。當條約內容傳到北京後，舉國為之震驚。因為這是自《南京條約》簽署以來清王朝所簽訂的最屈辱的條約，故從朝廷大僚，到民間有識之士，無不為之切齒痛恨。康有為曾為此發動了一千多名會試舉子公車上書，籲請廢約再戰，奮發圖強。臺灣舉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認為「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乞求清廷千萬不要割捨臺灣。然而，直接參與《馬關條約》簽署的清廷代表李鴻章與伍廷芳、羅豐祿等人的感情卻完全與眾不同。他們覺得談判來之不易，理應履行條約所規定的條款，甚至認為主戰派的廢約企圖，是無理取鬧，無事生非。對於侵略者日本，他們非但沒有憎恨與嫌棄，反而通過談判增加了好感，企圖依賴日本之勢力，與光緒皇帝為首的清政府討價還價。這真是國人從來未曾

19 對羅豐祿的評價，可參閱孔祥吉，〈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上層心態——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家書解讀〉，《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書社，2001），1~25。

想到，也沒有敢往這個方向去想的嚴峻事實。

李鴻章與伍廷芳的這種立場，在日本已公開發布多年的檔案史料中有詳細的記載。根據日方的檔案記載，伍廷芳在《馬關條約》簽署回到天津後，曾與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多次秘密接觸，這些接觸很多情況下是根據李鴻章的旨意詭秘地進行的。

根據荒川巳次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三日（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向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的報告指出：

> 天津發文機密第六號
>
> 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伍廷芳氏特地訪問本官，說明李鴻章伯目下地位及與北京政府諸大臣之間的關係，並謂此次通商條約談判於北京舉行，使李伯赴京，此舉有利於彼我兩國，與本官談話二小時，當時伍氏陳述的內容如左。
>
> 根據目前形勢，日清戰爭的結果，對於彼我兩國來說所得到的好處均甚少。日本也僅僅得到臺灣一島與一定償金而矣。一般來說，清國北京諸大臣對日本的感情與戰爭之前相比，幾乎沒有改變。他們沒有畏服日本之情，依然存蔑視日本之念，其結果似乎增加了親近露〔俄〕國，憎恨日本的情緒。至於講和條約內容，對於其他締結利益均沾條款的諸外國來說，同日本一樣均很少獲得利益。假如開廣西省梧州為商埠，或以北京為互貿市場，不僅能滿足外國人的希望，且能間接地矯正清國歷來的陋習，打破長期的迷夢，對清國政府也是一個很大利益。雖然條約談判初期，由伊藤伯所開口提出，也未見成效。這樣的結果無論是對締盟諸外國，還是對清國政府都是很遺憾的。總之，這次戰爭的結果對日清兩國均無多大利益。日本也只是多在天津獨佔了一塊租界，佛〔法〕國得到在雲南境內開採礦山，修築鐵道等利益耳。對於抱有很大野心的露〔俄〕國雖未發言，然而最為可憂。
>
> 其次，李鴻章伯與北京政府之關係日益疏隔，李氏照樣一人承擔日清通商條約的責任，談判決定後李鴻章最終也不被清國政府諒解，其地位之危險，乃是明白的事實。原來在北京政府內部與李伯意見

相同者，有孫毓汶（山東人）、徐用儀（浙江人）兩軍機大臣，早先與日本在煙臺互換條約時曾共同幫助李伯。當時清國閣員全都反對批准該條約，而伍廷芳親自勸說孫、徐，此二人遂進宮勸恭親王，結果使條約漸至批准。其中孫是敢為人物，政府內部各大臣及御史等忌憚亦甚，以勸批准條約而開罪天子，不幸又被御史所彈劾，本年七月（清曆六月）以至於不得不以病辭官。現今只有徐一人孤立於政府之中，到底非能持久，早晚亦將辭其職務，蓋為自然之勢。

清國國事日非，實在令人歎息。反之，對李伯最有力之反對者，內有翁同龢、李鴻藻（直隸人）兩軍機大臣，其勢力頗強，親露〔俄〕國而恨日本，隨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總督張之洞，是亦為李伯的有力反對者之一。張之洞又與北京政府疏通關係，其勢力頗盛，所以連接清國南北的鐵道建築大工程，也由該總督專門承擔。這樣李伯目前好像處在周圍都是敵國一樣，對國家重大事件，政府也不諮詢於他，李伯處於最不愉快而且危險之境地。對於現今的通商條約談判，幸而靠林公使建議，不在天津而是改在北京談判，使李伯能有機會赴北京制伏政府內部之反對者，說服猜忌者，並使翁、李二大臣也一同來分擔締結條約之責任。今後李伯倘有所為，實彼我之幸福，兩國之大利也，云云。

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說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見，李伯對目前處境甚不高興，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權力，他非常希望依賴我政府的威望，來恢復其舊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氣也明白顯露出，他雖然說為李伯考慮，實際上也為他自己打算。原來李伯作為清國唯一政治家，通曉內外時務，即使北京政府諸官吏集忌憚猜疑之念於其一身，並試圖千方百計加害於他，然至今仍對他無可奈何。可見，李伯確是有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國力，戰敗後特別敬慕於我，已溢於言表。反之其他當權大臣均不曉事理，親近露〔俄〕國，蔑視日本，對我甚為不利。我方應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滿足其希望，將此次通商條約的談判改於北京舉行，使李伯能制伏那些反對者，使其權力增強，而讓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

擔簽署該條約之責任，亦不失為當前的一個政治策略。另外，關於伍氏之密談，可見本年七月三十一日的電信報告。為了慎重起見，特再次申進。敬具。

在天津一等領事 荒川巳次 明治廿八年八月三日[20]

這是伍廷芳在煙臺換約完畢，回到天津後與荒川巳次的一次長談。這次密談涉及了許多至今不為世人所知的重要內容。

其一，清廷內部對《馬關條約》爭論不休，最後經過伍廷芳親自去登門勸說，敦促朝廷內部主和派軍機大臣孫毓汶與徐用儀出面，勸說恭親王同意，才排除了朝廷內部主張廢約再戰強硬派的阻力，使煙臺換約如期進行。

其二，伍氏認為，由於甲午戰爭的結果，清廷上下瀰漫著親俄國、恨日本的情緒。從湖廣總督張之洞，到清廷上層的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都有親近俄國、憎惡李鴻章的情緒，他請日本對此動向予以關注。

伍廷芳作為一個受到西方系統教育的外交家，對當時國際國內局勢的判斷有敏銳的一面。甲午戰爭的硝煙尚未從神州的上空消失，張之洞、劉坤一等即向朝廷建議請聯俄拒日，其思想在張之洞的奏章「請結強援片」中已流露無遺。[21]一年之後，果然出現了清廷與俄國結盟的《中俄密約》。伍廷芳沒有料到的是，《中俄密約》卻是伍氏極力維護的上司李鴻章親自主持簽訂的。李鴻章由原來的「敬慕」日本，卻轉而接受了俄國的鉅額賄賂，搖身一變又成了清廷內部俄國勢力之代表人物。[22]而在當時，伍廷芳的這些言論，則完全是在為日本著想，他甚至還嫌日本從《馬關條約》中獲得的不夠多。

其三，伍廷芳公然請求由日本政府出面，依賴日本戰後之威力來恢

20 駐天津荒川巳次領事向西園寺公望外務大臣臨時代理發出的機密第6號，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三日。見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東京：原書房，1967），614~618。譯者小野寺史郎。據伊藤所編此書記載，會談進行了十二小時，而馮青考證，似應為二小時。

21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瀋陽：遼寧教育，1988），204。

22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59。

復李鴻章失去的權力。伍氏認為，如果李鴻章能繼續有所作為，「實彼我之幸福，兩國之大利也。」

伍廷芳還進而指出，即將開始的中日商約談判，由於日本駐京林董公使的勸告，放棄在天津而在北京舉行。此舉為李鴻章親赴北京說服反對者，恢復其權力，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約談判中把翁同龢等總理衙門大臣也拉進來談判，分擔責任，實在是聰明過人之策略。

總之，伍廷芳把最為機密、最為緊迫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稟報，並且希望同日人攜手共同對付朝廷中以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

伍廷芳的這一番密談，使這位駐天津多年的日本領事都不勝驚詫。他急忙將此內容稟報給了日本外務省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而西園寺則很快將它轉達給了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其奏報之文曰：

> 關於通商條約談判伍廷芳談話（親展送第一一六號）
>
> 內閣總理大臣侯爵　伊藤博文閣下
>
> 關於通商條約談判與李鴻章幕僚候補道伍廷芳談話之件，從在天津荒川領事那裏，有一份專門書寫的報告，為供閣下參考，現重抄寫呈進。
>
> 外務大臣臨時代理文部大臣侯爵西園寺公望
>
> 明治廿八年八月廿四日[23]

西園寺把一個小小的天津領事的報告呈送給總理大臣，這件事情本身說明日本政府對伍廷芳所提供的情報絕非是等閒視之的。伍廷芳作為清廷的大臣，居然與日本政府站在一起來對付朝廷內部的政敵，在如此重大問題上，敵我不分，本末倒置，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更有甚者，伍廷芳還曾多次同羅豐祿一道找荒川巳次交談，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出力，向清廷最高統治者施加影響，讓伍廷芳去擔當對清國政治會有重要影響的駐日本公使。他們的這一秘密活動亦由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向日本外務省的負責人如實稟報。其文曰：

外務大臣臨時代理、文部大臣侯爵西園寺公望閣下

意料之外我在當地感覺很好，萬事圓滿，再次來此地任職，感到非常愉快。伍廷芳、羅豐祿二人，常常來往於李鴻章和本領事館之間，多次說起清國的命運非常困難，日本駐北京公使的刺激對清國的改革很重要。由於遭到軍事失敗，已經沒有什麼氣概了。至於外交的失策，更是不用多說，現在清國處在俄國的爪牙之下，恰似昔日朝鮮處在清國之下一樣，說不定最終將四分五裂，自取滅亡。他們還透露說北京的翁同龢獨攬大權，最反對李鴻章。因此，駐外公使的職位，也很難輪到李的部下。所以，前幾天向林公使講到了這個情況，希望（林公使）能間接地向清國提出，派遣伍廷芳這樣的通曉國內外大勢的人物到東京出任公使。

再有，關於旅順軍港船渠內部器械設施的維護保存及妥善使用方法，李鴻章亦命伍廷芳前來相告。對此，本官將會再作進一步報告。

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24]

荒川說，伍、羅二人對甲午戰後中國的前途完全失望，甚至認為中國「恰似昔日朝鮮處在清國之下一樣，說不定最終將四分五裂，自取滅亡。」荒川的報告所涉及的上述內容可以在羅豐祿的家書中得到印證。羅氏在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1895年1月27日）的家書中，曾寫道：「大局如何收束，正未可知……其勢必至於土崩瓦解。」[25]又云：「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恐將來時局難測，多寫一信，恍如多見一面。」[26]這些悲觀失望的言辭同伍廷芳之密談簡直如出一轍。伍廷芳先是向日本輸送有關清廷上層的政治情報，以取得日本外交人員的認知與同情。然後，再由日本公使向朝廷提出由伍廷芳

23 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614~618。譯者小野寺史郎。

24 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436。譯者佐藤隆。駐天津荒川巳次領事向西園寺公望外務大臣臨時代理發出的電文，編者未署日期，據馮青考證，似應為一九九六年五、六月間。

25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14。

26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16。

出任甲午戰後的駐日公使。伍廷芳的這一系列做法，都是按照李鴻章的意旨進行的。

四、在北京與林董公使之密談

如果說，伍廷芳、羅豐祿向天津的日本領事荒川巳次所云，還是零星孤證，還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話，那麼日本檔案中還有更進一步的記載。這些記載不是在天津，而是伍廷芳在北京與日本公使林董的直接交往。

清廷主政者長期以來閉目塞聽，昏聵愚昧，關起門來稱王稱霸，對外部世界如何飛速變化，他們既不瞭解，也不屑於知道。因此，他們把對外交涉這樣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委託給少數幾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委託給這些號稱通達外情的洋務派官僚全權處理。至於這些重大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的，當政者也是若明若暗，心中無數。正因為如此，在《馬關條約》簽署未久，清廷又任命李鴻章為與日方談判的商約大臣。如上所述，根據日本駐京公使林董之建議，這一談判地點由天津改在北京。於是，李鴻章又帶著伍廷芳一起來到北京參加與日使談判。剛到北京，伍廷芳即受李鴻章之命，秘密來到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同林董公使閉戶長談，這次交談涉及清廷上層的政潮起伏及人事糾葛。對此次重要密談內容，可以從林董之密報中窺其全貌。林氏之報告稱：

機密第三十九號函

關於伍廷芳來訪談及李鴻章目前處境，軍機處內部翁同龢與徐用儀之間所發生之事以及李鴻章調任陝甘總督傳言的報告。

外務大臣臨時代理侯爵 西園寺公望閣下：

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李鴻章至京。然後朝廷發布了李氏留京入閣辦事之旨，對此本應詳細報告，但因當時不知其來龍去脈，故只有臨時簡報，詳見八月二十九號本公使第三十八號函。此函指出，李氏從

天津出發之前，曾透過荒川領事傳話，略謂，至京後大約十日之間，雜事特多，可能無暇拜會貴公使館，因此特先致歉失禮之處。因此，李氏至京後本使只能間接窺其動靜而已。

正當音信不通，且正著人密查李氏此次轉任是如何議定，而尚未有確切消息入手之際，隨同李氏入京之伍廷芳突於昨日來訪，火速會見。於天南地北閒談之際，本公使問及此次李氏事件始末。

據伍氏所言，李中堂自日本歸國後，按照慣例理應上京復命。無奈身體疲勞，起初請假二十日。隨後再請假三十日之際，因朝廷接獲閣下以公使身分來任，為商議條約等事宜，受命全權處理。故李鴻章原擬於天津等待與閣下會面，因為知閣下遞交國書後下津，故持續留津相待。直到閣下謁見等事完畢後，仍然毫無下津之舉。何時下津，也未可知。且李氏自去年來，諸事不順，譭謗交加，集於一身。如此一來，李氏以為唯有親自上京辯明之外，別無他途。因此，此次赴京四五日前，曾奏請上京復命，再從天津出發。

此間，翁同龢嗾唆翰林及御史等一夥人多次上書彈劾李鴻章。因此，李氏拜謁之時，皇上極為震怒，對李氏所言，一事也不採納。舉例為證，此回與貴國締結商務條約，李氏奏請希望在總理衙門任職之大臣一名，能夠出面擔任全權委員（李氏意在翁同龢出任）。皇上答稱，總理衙門之大臣，並不通曉外國事務，命其當委員毫無用處，對李氏建議並不採納。總理外國事務之大臣不通曉外國事務，確實令人驚訝。然而天子之論如是，李氏也不得抗辯，就此退出。

皇上曾考慮重罰李氏，但是，李氏為皇太后垂簾聽政時代的重要大臣之一，勤勞有功。如果執意處分李氏，頗有忌憚，姑且與皇太后商議。皇上處分該處分之大臣，本為當然之事，似乎不必報告；但是，李鴻章貴為國之重臣，從來持皇威，臨大事，保治安，有勳功；此回雖有過失，當然期望朝廷慮及過去辛勞，寬大以對。但是，據伍氏所述，黜罰難免，欽令入閣辦事（詳情曾有前本公使第三十八號函）。所謂入閣，即進入內閣之意。內閣係文華殿側之建築物，

有屋宇而無出入之人；有役所，而無可辦之事。因此，是有名無實之閑官。對李氏來說，著實委屈。但是，如閣下所知，清國係君主專制；皇上之言，不論是非，言出必行。然其君主到底具何見識？自幼依宦官宮妾養在深宮，對人間世界除後宮之外，並無見聞。故無熟稔世故之機會，一旦親臨其政，聽其自幼受教師傅之言，再下定奪，勢頗自然，職是之故，目今可作如是之言：「清國政府之意見即翁同龢之意見；翁同龢即清國政府。」雖貴為李氏，亦無可奈何。

伍氏滔滔不絕談論的翁同龢，本使有兩三度面談之經歷。觀其所言，頗有書生氣息；容或有不通曉今日世上之情事。但此為無知之罪，並非有惡意之人。本使認為，隨著通曉新事，見識亦改。

伍氏云，閣下聽翁同龢之言，信之乎？此事頗為危險。今舉一機密之事，以瞭解翁之為人。

曩者，以露國擔保，議起借款，翁同龢極其贊成；而徐用儀深深反對。最後，演變至兩氏於御前爭論不休。徐用儀自引不敬之罪請假，其後有辭職之意。翁同龢私下訪其寓所，陳謝其紛爭之過，望在御前和好；並勸其忘卻先日之事，復出衙門。因此，徐氏同意再度出勤。此時，翁卻中傷徐氏，最後徐氏受命退出總署及軍機處。至此，徐氏進退維谷，此皆出於翁氏濫用皇上信任，報復睚眦之手段。翁氏之為人由此可知。

可是，據伍氏所述，翁氏與李氏不相容，是因翁氏對李氏懷有舊怨。此事本使亦嘗聞及。所謂舊怨係指咸豐九年，即我安政六年，長髮賊猖獗，攻陷安徽省鳳陽府下定遠縣；當時該省巡撫翁同書，即翁同龢之兄（翁氏有兄弟六人，同龢排行第六，同書為第四兄），棄城遠遁；導致壽州城亦遭攻陷。曾國藩逐一調查詳細始末，劾奏朝廷。因此，咸豐十一年，翁同書被召還北京。翌年，即同治元年正月，翁同書以苟且偷生之罪免職。其後，六部九卿會議遞上，具奏罪名；結果，翁被處以斬監候，即待命斬罪。有此因緣，翁同龢懷

> 怨曾國藩，似乎也延及其子曾紀澤，曾紀澤在世，因翁同龢為皇帝文學師傅，有事皆刻意與翁同龢交際。與此相反，以李鴻章之看法，認為翁等儒生俗吏，不識時務，些許不足以共談。有此認識，往往對人破口大罵。前述定遠攻城之當時，翁同書遠遁等始末，李鴻章係安徽人，故另向同省人逐一詳細進行調查後，向曾國藩告發，導致了曾國藩之劾奏，六部九卿之具奏，最後導致翁同書待命斬罪之事。此為伍廷芳所謂翁氏對李氏之舊怨。
>
> 究竟伍氏所述，可不可信?
>
> 即便李派片言隻字全然不可聽，也不難想像其所述大抵皆為事實。然而清帝寵信翁同龢，疏遠李鴻章，此事似乎是在所難免的，卻也產生一大事件。將來是否有機會發生翁氏個人能力無法調理之事；或是清帝積累經驗，變成不專信翁氏之言，頗難逆料。但是，在此以前李鴻章無法扳回勢力，而且，李氏年事已高，說不定無緣逢此機會。
>
> 又，根據內部密探報導指出，李中堂，即李鴻章於本月十三日交卸欽差全權大臣關防，並有內信欽派為陝甘總督，俟有確信，再行報聞。然至今尚未有確實報導，並此奉知。此致
>
> 特命全權公使　林董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三日[27]

伍廷芳在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1895年8月3日）在天津談話時，已提到軍機大臣孫毓汶受到言官彈劾，迫不得已而辭官，而他的夥伴徐用儀孤立於政府，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時隔一月，又向林董報告徐用儀被光緒皇帝逐出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可見，伍廷芳向日人通報情況是非常及時的。

甲午戰爭中，清廷上層主和派外有李鴻章，內有孫毓汶、徐用儀，而他們的後臺則是恭親王奕訢與慈禧。他們內外呼應，串通一氣，以至使光緒皇帝的主戰政策無法實施，從而導致清廷在同日本作戰中，水陸

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譯者林文賢。

交綏，戰無一勝。伍廷芳向日本公使林董敘述的清廷高層人事糾葛，可在《翁同龢日記》中一一得到證實。

再有，林董公使認為，翁同龢「頗有書生氣息，容或有不通曉今日世上之情事。但此為無知之罪，並非有惡意之人。本使認為，隨著通曉新事，見識亦改。」其對翁氏評價，比伍廷芳還要客觀些。林董並認為，伍氏所述「大抵皆為事實」。但是，「將來是否有機會發生翁氏個人能力無法調理之事；或是清帝積累經驗，變成不專信翁氏之言，頗難逆料。」林董的這一觀點亦被後來的歷史所證實。戊戌四月，光緒帝頒佈硃諭，將翁氏「罷黜」，正是他「不專信翁氏之言」的結果。

五、首次與內田康哉密談

伍廷芳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由於李鴻章的鼎力推薦，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被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及秘魯的全權公使。在駐外期間，他為在美華僑利益做了不少工作，在國內變法運動高潮中，伍氏亦頻頻提出十分重要的革新建議。面對時事方艱，強鄰逼處的危局，伍廷芳指出，外援不足恃，密約不足憑，應速決大計，從根本上變起。他還特別強調議院與報館之作用。聲稱：「報館宜推廣也，古者國有大謀，詢及士庶，春秋時陳迫於吳楚，猶朝國人而問焉。蓋輿論所在，公論自出也，西法議院與報館相為表裏，政有不便報館引其端，議院即為伸其緒，故上畏清議而下無隱情。相應請旨通飭督撫，於所屬郡縣，次第擴充廣開報館，風聲所播，民智自開。公理在人心，公議在天下，則強鄰環伺，可以預伐其謀；敵兵要求，可以藉〔卻〕其請。」[28]

伍氏之建議，切中中國改革的要害，不愧為金玉良言，可惜未能實行。由於百日維新很快便曇花一現地以失敗告終。因此，伍廷芳的許多積極建議，均未得到採納。

光緒二十八年（1902）伍廷芳結束了在美國的六年任期回國。歸國

28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33~38。

未久，伍廷芳又被任命為商約大臣，在滬上與英、美、日等國商議航海條約。[29]慶親王之子載振由外洋考察歸來，清廷為了振興商務，專門成立了商部。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1903年9月7日）清廷命載振為尚書，伍廷芳為左侍郎。同年八月十八日（10月8日）清廷又任命伍氏與呂海寰、盛宣懷一道與美使康格等續訂通商航海條約。又鑒於他對外情通達，故清廷曾任命伍氏與沈家本參酌中西律例，對中國傳統司法進行改革。可見，伍氏自美國返回後的一段時間內，是頗受清廷當權者重視的。

當時執掌清廷政柄的慶親王及其子載振都對由美國歸來的伍氏頗有好感。尤其是載振在美國考察期間，對伍廷芳在駐美公使任內的表現甚為滿意。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慶王與載振被周圍的貪官污吏所包圍，舊態復萌，載振歸國後的銳氣亦漸漸消退。隨之而來的賣官鬻爵，歪風邪氣，彌漫了整個北京城。他們自然對伍廷芳也日趨冷落，並且將伍廷芳由商部擠到了外務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伍廷芳又開始同日本駐北京的公使館頻繁交往，尤其是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日本公使內田康哉之長時間談話，涉及清廷的內政外交，日俄戰爭以及伍氏個人前途。此次交談對瞭解當時政局及伍廷芳當時思想狀況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由於伍氏所談內容極為豐富，內田康哉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整理就緒，然後向東京的日本外務省大臣小村壽太郎稟報。其談話要領大約可區分為以下五部分。

其一，敘述伍廷芳對日本的感情之由來。內田之報告稱：

> 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閣下：
>
> 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前與本使述及欲詳加密談一事。上月十三日夜，伍悄然來訪，就時局問題、滿洲善後策、清國已無改進之望、清宮廷內情以及自己立場等做長時間交談，其談話要領記述如下：
>
> 伍曰：明治十八年天津條約談判之際，初蒙伊藤侯爵之知遇，以此

29 羅明等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7，275。

> 漸獲日本友人多人。伍談到，今晚談話本不是以清國一官吏之資格，而是以清國一愛國者，日本一親友來做此詳談。本使亦快諾，亦非以公使之資格，而是以日本一愛國者，清國一親友，在此將腹中所見彼此交換。由此漸入話題。[30]

據此可見，伍廷芳對日本之好感，起源於光緒十一年（1885）的天津條約談判之際。據日本駐華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對此事件之記載：

> 光緒十一年（1885）日本為與清廷討論上年發生的漢城事變，特地任命伊藤博文為特派全權大使來華，先在北京與總署交涉，再返回天津與清廷任命的全權大臣李鴻章商談。伊藤博文一行於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885 年 4 月 2 日）返回天津，次日即在直隸總督衙門會談，二十日（4 月 5 日）即在日本駐天津領事署再談。二十二日（4 月 7 日）在北洋水師營務處再次會談。據中島雄稱，在會談過程中，李鴻章等人還專門介紹伍廷芳是在英國獲得證書的律師，有關伊藤博文此次會談之英譯文書，可由伍氏閱讀。伊藤博文欣然允諾。[31]

雖然中島雄沒有詳細記述伍氏與伊藤博文接談之細節，然而，伍、伊二人初次相會，當為天津會談之時，則是毫無疑問的。正是通過在天津的談判，伍廷芳與伊藤博文相識，而伊藤博文作為有經驗的政治家、外交家，頗為器重由倫敦留學歸來的伍廷芳。關於他們會見的談話尚未見諸其他史料記載。但是，可以斷言，伊藤博文對伍廷芳之才能，多有誇讚，且予以恩寵，故而使伍氏對此久誌不忘。而且由感激伊藤博文「知遇之恩」，伍氏開始對日親近，結識了許多「日本友人」。

其二，伍廷芳詳細地敘述了他同慶王父子的關係及其在官場中失意情形，揭示了清廷當時的黑暗內幕。內田之報告云：

> 伍廷芳道：在北京上任以來，就為如何籌畫清國之富強改進而焦慮，但毫無結果。恥甚，憾甚，不得不斷言清國已毫無改進之望。

30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譯者孫偉珍。

31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清交際史提要》，編號1－1－2－54。

伍講道：無論是過去在商部，還是現在在外務部，其所主張無一被用。外界將與各國公使交涉上之失策，卻俱歸咎於其本人。批評說伍廷芳多年在海外勤務，以外交通自任，亦不過如此。伍氏認為外務部目前愈來愈㈱守總理衙門時代傳來之筆法，連一公文書之作成，亦不問其論理邏輯，只一味全力傾注於字句末節。

義和團事變後，幸而有小村公使及美國公使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之負責，慮及清國之前途，改編而成外務部。但官制改變亦不能收預期之效果。外務部徒為總理衙門之異名衙門而已。

觀清國之外務部，現由五位大臣所領（總理、兩會辦、兩侍郎）。但無一人主動擔負責任，此恐不為外人所知。舉一例而言，從事日本及歐美諸國語言翻譯者在外部有五十餘名，但在此狀態下俱不能為公奉職。

由此伍氏愈感自己於國無益，故生斷然南歸之決心。然而清國事情不若日本及其他諸國，不可能有隨意辭職之舉，定要運用手段，以達成所望。離開京城一事，自己之政敵定會四處傳揚，指為失敗者而為中央政府放逐。以上事情，公開陳述自己之見解，為防友人之誤會，伍氏特說明本次談話之旨。

伍廷芳與本使是多年之交。其為人淡泊，但時有輕躁之舉，發不能實行之空洞議論，在外務部日久，調和新舊分子，漸次扶植自己勢力，此自不待言。此次本使未曾料到伍會如此迅速生離任之念。之所以如此，伍氏謂現在外務部之處境狀況多不能滿其意。推查更重要之原因，當是由於伍失去慶親王父子之信任。本使嘗試建議伍氏幫助慶親王父子的新政。伍言道，慶親王優柔寡斷，終不能成其器。又載振貝子巡遊歐美，平生以來初次接觸異地之事物，身受歐美文化之刺激，歸來後向其父王建議下決心推行新政。此亦是事實。但載振歸來，其四周舊有之情狀依然如故。載振來勢雖猛，但畢竟年少，一時受歐美之刺激，便作發奮之決心，但此終不可能持久。時日一過，歸至今日，其已完全恢復出洋前之貝子行狀。故其勢力雖

可依賴，但靠其推行新政，可斷言無望也。

如上，伍廷芳之斷言，乃其性格之所以然。伍氏雖多少有入極端之感，但是對於我來說，瞭解其個中消息已足矣。載振貝子由海外歸來，憑其父王威勢，就任新設商部之尚書。當時伍廷芳被委任負責清國條約改定之任，正在上海同日美等國委派之員商議彼我之條約。然而當條約即將簽定之際，當時伍離開上海當會給條約簽定增添巨大之麻煩。但朝廷卻促其北上，舉而任商部之右侍郎。時雙方之需，可謂極大。當時貝子作為新任之身，曾攜左右侍郎訪問本使，肱股中有於清國之內情老練之左侍郎陳璧，於國外之事經驗豐富之右侍郎伍廷芳，頗為意氣昂然。但事不如意，伍廷芳亦沒有表現出貝子於美國所見辦事果斷的手腕，且二人時有意見相左之處。不久，伍廷芳轉任外務部，參與滿洲事件籌劃。當時其屢屢以電報向上司報告，就時局提出適切之方案。但上述之議俱被看為不可行之說，其聲望亦於內外漸失，由此漸被慶親王父子疏遠。

伍為慶親王父子疏遠，即如上所述。他在朝廷內亦無任何勢力，其去留亦於我無特別影響。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卻也於我有所妨礙。伍至少受過歐美教育，且其性質純良，有脫卻清人氣味之處，反復認真說明事理，便能得其理解。可見，伍氏若在位，或有可用之處。然而，如其去任，後任之人或於我不利。所以應使其轉變決心，繼續留任。本使以此意勸告伍，但伍去意頗決。並言，作為清國公使駐華盛頓時，總能盡自己職務，按所思行事。如今日之互相推諉責任，一事無成，留任亦非上策。莫若做一地方官，以全權處理所管轄地之內的事情。但是由於清國官規，不許離任，故現無良策，若有方便，應早日南歸云云。

伍又言道：即為閒散之身，亦不會忘為國盡力之道。當以餘生著書，多少於清國之開發會有所貢獻的。伍敘說他所觀察的今後清國之事，認為若無日本之誘導輔助，其效俱無。故伍氏頻頻主張日清同盟之說。

> 本使對此亦做了相應之回答。勸謂：同盟之效力，須兩同盟國對等之地位及對等之國力。若非此，則其效亦無。清國今日之急務，在於先講自強之道。而講自強之道，清國之現狀，又不得不憑藉外人之救助。現今國家甚多，然而亦不會有一個國家唯獨對清國予以親切照顧。這在表面自不待言，緊要者乃彼此心中應有敵我之分。又舉袁世凱暗憑日本人之力，講求自強之道之例，勸其亦能如此。[32]

據以上談話可知，伍廷芳在美國任內，曾對中國當時的改革事業與富強之策多有思考，頗有一番改造山河的雄心壯志。可是，當返回北京之後不長時間，伍氏即被當權的滿族親貴疏遠冷落，在失望之餘，伍廷芳決意去官。然而，日本公使出於自身的考慮，卻對這位「為人淡泊，但時有輕躁之舉」的外務部侍郎頗有留戀之意，以為伍廷芳在位「或有有用之處。然而，如其去任，後任之人或於我不利。所以應使其轉變決心，讓其留任。」這再次說明，伍廷芳把內田康哉當作朋友而推心置腹，而內田則把伍廷芳當作利用的物件。

其三，伍廷芳還向日本公使談到光緒皇帝的危險處境。其文曰：

> 伍又語及清國宮廷之現狀。言太后於清國婦人中誠為人鳳，但終究不免於婦人之見。於近來尤念餘生之安樂。每日日課，聽畢軍機大臣奏問及各地地方官之奏報後，又暫讀日刊京報。其後便入頤和園內行樂度日。至於皇帝，始終受制於太后，大臣拜謁自己之時，草草一二言，一切問答，俱依太后行事。問及近來皇帝與太后之關係如何，伍不作直答。對皇太后駕崩後皇帝會如何之問，伍言道：亦如世間傳聞，誠為清國憂心之事，萬望無生此變。伍話中之意，皇太后駕崩之日，誠為皇帝身上禍起之時。今圍繞皇太后之宮廷大臣，及監官等俱知太后駕崩即其終之時。於太后駕崩時，當會慮及自身安全而謀害皇上。此時，萬望能以我守備兵救出皇帝。[33]

伍廷芳的這段談話，對於光緒皇帝之暴亡原因作了直言不諱的說明。其實，這對當時清廷內部來說，幾乎是人們所共知的秘密。因為光緒皇帝

32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3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當時只有三十出頭，慈禧則已七十開外，而他的政敵袁世凱、李蓮英等人，是無論如何不會讓他死於慈禧之後的。光緒的存在與否，對袁世凱等來說，是關係到他們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他們決不會等閒視之。然而，對這起撲朔迷離的晚清宮廷疑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史學界頗有誤解。有人竟從研究宮廷醫案藥方入手，得出光緒皇帝是自然死亡的結論。伍廷芳的這番談話，無疑更能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不過伍廷芳希望日本駐紮在東交民巷的守備兵屆時能搭救皇帝，實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四，伍廷芳還同日本公使內田詳細討論了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之結局及其對中國之影響。內田之報告稱：

> 另外，對本使有關日俄之爭之詢問，伍答道：日俄開戰後，本公使多次發給慶王之公報及來往電報中之緊要部分翻譯後，慶王時常奏上。日本勝利之報，雖相信兩宮俱能得知，其分量則經軍機大臣等刪改。但是，如果相信清國人俱對日本之戰勝報告欣喜乃是一大錯誤。不可不知朝廷內部有一老大之俄國黨存在。此輩乃長年由俄國獲取利益，有割不斷之關係。尤其近來，原先中立者亦覺雖日、俄俱不可靠，但依靠俄國收益最大。此輩人等雖口中對日本戰勝不勝欣喜，其實心中不然。但他們並非為清國而有此戒心，徒妄以俄國取代日本而已。如外務部左侍郎聯芳等，當那桐在場時，便對日本之勝報作欣喜狀，但其心中實非如此。其言談中時常為俄國之行動辯護。故張蔭桓生前曾對自己明言：聯為俄國之間諜。其最終亦不能與俄國斷絕聯繫，其女兒即為俄國黨塔克什納之子妻。伍更言曰：滿洲人全都不擅長應接辭令，那桐尤甚。其日日之事務處理，與外國人接觸周旋、做深思熟慮之行俱不可能。伍氏還敘述不論滿漢，清國人相互嫉視之狀。斷言就今日之狀態，若無日本之誘導，清國終究無改進之望。至於日本誘導清國之最有效方法為何？伍氏亦終不能明示。
>
> 其次，伍論及時局問題。言戰爭結局應以英法等國調停為主。俄國不管如何戰敗，俱不會向日本求和，自然會等其他各國調停收拾殘

局。結局會如「柏林會議」一樣召開列國會議。

本使提議其不論進退如何，且待時局之發展。伍再言日俄開戰前後其不得要領之提議，恐多少會妨礙我自由行動。因此今日充分預防為上策。又互相談論如下情況：列國會議非任何情況俱能組織，亦非任何國家俱可自由參加之會議。須有參加之理由與權利。即柏林會議為克里米亞戰爭後簽定巴黎條約之國家開設之。巴黎會議即為克里米亞戰爭參加國之英、法、意、俄等及於地形戰略上不得不列席之國參加之會議。今日之日俄戰爭，開始即經各國承認，其戰局限於日俄。故應按事之順序，今欲收拾其局亦應由日俄兩國為之。無故召開列國會議，將引起混雜之局面，以至犧牲清國而達成某種協定。伍曰：清國有參加日俄協定之利害關係。此為自然之事。日本當與清國商談，俄國亦應當與清國協定，或者應由日、俄、清三國協商。又觀此後戰況，及他日或許應由他國好意之調停，但不論情況如何，相信本次之戰爭，有切身利益之清國不問日本做何想而擅自召開列國會議，將會給日本極惡之感情。本使又將以上情況向伍言明。

又問及滿洲善後策。伍道：前幾日來政府部內就有討論之。聞及趙爾巽、陳璧等總督巡撫曾指要我處理。據本使所聞及消息，伍亦為上述候補者之一人，伍道其初次聞之。但伍廷芳又曰：無論如何，其不願去滿洲就任，但是滿洲卻是不可不改革的。究其方法，伍之意見人物名目雖多，但終歸須由日本引進為數頗多之顧問，除此別無改良之辦法。[34]

伍廷芳的談話也涉及清廷內部重要機密，即在朝廷內部有一個老大的親俄國黨存在，其代表人物即是聯芳。聯芳當時為外務部左侍郎，當年同伍廷芳一起去煙臺與日本代表履行《馬關條約》的換約儀式。而且張蔭桓在總理衙門早已發現聯芳為俄人之間諜。伍氏之揭示，要可深信。聯芳與俄國人的秘密交接，當會於俄國檔案中得到充分證實。

34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再有，伍廷芳把滿洲地區的改革與前途完全寄希望於從日本引進為數眾多的顧問，而忽略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意圖。再次說明了伍氏本人當時的親日立場。

其五，內田之報告，再次揭示了伍廷芳企圖借助日本公使及其夫人對慈禧的勸說，使自己獲得慈禧與權貴之重用。內田報告的最後部分稱：

> 去年秋天，伍應載振貝子之召北上，時頗得意。一日伍曾對本使言道：清國維新之政，需先促動皇太后；而促動皇太后，與其清國之人，不如外國人有效。故本使應同英、美公使商議直接向皇太后面奏，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屢屢赴大內拜謁之機，利用多少瞭解清國語之便利，向皇太后敘說維新改革之必要，並勸奏利用如伍廷芳等有海外遊學經驗之輩，使其獲得高官要職。
>
> 對其熱心主張，本使向其解釋不可之緣由。答曰：如上直奏，或可有用於一時，但屢屢如此，將會招致相反之結果。若日、英、美公使俱照此做法，定於清國無益，倘若其他公使效此辦法，則皇太后之地位，恰如韓國皇帝一樣。此舉甚為不可。
>
> 上述談話之後，伍廷芳屢屢同本使就各種事項商談。但是，雖有常談，不幸常有不能贊同其說之時。英、美公使對伍廷芳亦有相同之感。事實如此，其所依賴之日、英、美公使，亦均不能贊同其說，伍氏與慶王父子之關係亦如前所述，以至其生退隱之念。
>
> 連日來，伍稱病不去外務部，偶有人訪，即言清國改良之難，自己早晚南歸等等。
>
> 上述事情雖多為伍廷芳一人之事，但多少可瞭解清國官場之消息，可供參考。特此長文上報。
>
> 在清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印）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35]

由內田康哉的上述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伍廷芳是非常想借助日人之推薦，在朝廷晉升高官的，非但對日本公使如此，對英、美公使亦抱有同

35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樣幻想。而日本的公使則認為這是一條行不通的路。伍廷芳在朝廷內部沒有後臺，只好乞求洋人的幫助。靠外國公使從旁吹說來升官。伍廷芳為了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利用外國人的從旁「吹說」，這種做法暴露了伍廷芳人格中不甚光彩的一面。

六、再訪內田康哉

伍廷芳在上次密談後，並沒有採納內田康哉讓他繼續在外務部留任的建議，因為他對於京師封建官場烏煙瘴氣及腐敗現象，已傷心透頂，而他改造中國的雄心壯志絲毫也沒有機會施展，故伍氏急於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但是，中國的現實又使伍廷芳不能如願而行。因此，三個月後，伍廷芳又再次登門拜訪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將他掌握的清廷上層動態及日俄戰爭的有關問題，再次與日本公使密談。其談話內容亦被內田原原本本地向日本外務省稟報。其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伍廷芳向日本公使講述了他個人的情況，及面見慈禧之經過。其文曰：

> 致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閣下：
>
> 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有辭任之志及其人關於清國內情與我密談一事，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密字第五十五號件具體稟報。其後，因其志未果，伍遂以療養病體為由，赴上海並提出辭呈。但其辭書未至，返京之命令卻已抵達。本月五日抵達京城，並於九日訪問本使，作如下談話。
>
> 伍先慨歎其辭任未果之事，言清國之特殊政治組織異於各國。不允許個人自由行動。既然已經不允辭任，除盡自己職分外別無選擇。接著伍詢問其不在時發生於芝罘捕獲俄國船一事及在上海俄船處理情況。當本使詳細明示我方主張之後，伍始知我方有充分之論據。
>
> 伍廷芳又言及其歸任後拜謁皇太后及皇帝之情形：前幾日拜謁之時，其決意將清國今日之實況奏上。伍奏道，清國今日既無陸軍亦

> 無海軍，幾同於毫無國防。對如此毫無忌憚之直言上奏，皇太后邊聽邊由袖中抽手巾拭淚，並嘉納其所奏請。諭示其他軍機大臣當盡心協力，以免耽擱大清之國防。
>
> 本使對伍廷芳的直奏表示賞贊之意，並告之其舉動實為清國之一大善事，定會使皇太后瞭解清國之實況，將來當於清國國政更張提供莫大方便。[36]

伍廷芳五日到京，九日即訪問日使，他把剛剛發生的事情亦向日本公使報告，而且事關清廷國防。

其次，伍廷芳還就在日本佔領滿洲期間，清廷向東北派遣地方官一事徵求內田意見。內田之報告謂：

> 伍又詢問道，對趙爾巽赴任滿洲一事是否懷有異議？本使答曰，既未同趙會面，且其赴任滿洲乃清國政府之事務，對此，贊同與否實不便回答。伍又詢問文韜赴任營口道台被拒絕之理由。我遂開陳訓示之旨，言道：在戰爭之地是不能不服從軍事作戰目的的。今營口為我佔領，成為軍事上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其全部需要俱為軍事設施之需。當此之際，清國道台赴任營口，亦無任何可為之要務，今能遍覽戰時各國之例規，看破實際情況者幾無。總之，尋常之清國人事事拘泥，文韜如赴任，其結局對日清雙方均為不利。由此，他不去赴任反而於清國有益。伍諒察我之大旨。話題漸轉至新近清國正在熱烈討論的滿洲。本使回答：清國政府既然承認滿洲為日俄戰地，軍事設施之必要即毫無疑問，政府當局以外之清國人將滿洲視為平常之地，而日本經流血佔領，且今後又面臨大敵，無視於此，視日本擅自不返還滿洲，同俄國無異，此論謬誤之至，須知開戰後日本才佔領滿洲。[37]

東三省本來是中國之固有領土，但是，朝廷要派遣官吏赴任還需要徵求日人意見。甚至清廷往營口派遣的道員，居然遭到日方的無理拒絕。可

36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3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見，清廷當時是何等腐敗，侵略者又是何等霸道。

其三，雙方還討論了關於日本戰勝俄國之後，滿洲的前景將會如何。其文曰：

> 當時伍問本使日本之財政如何？本使答曰：其不足顧慮。俄國若承諾我國認為必要之條件講和，則日本亦不勉為再戰。關鍵是不復有破壞東洋和平之舉。然而，若第三國中途妨礙達成和平之保證，日本對其國亦不心懷嫌怨。但歐美諸強國已對戰勝後日本之駐地先做預想，如你所述，此誠不易干涉。對日本戰勝後各國如何預想我之駐地，以及第三國干涉問題，伍廷芳舉日清戰爭之例，似對本使所說並不理解。伍曰：只要其留任外務部，今東洋日清韓俱無所依自不待言，同時日本取得最後勝利成世界一強國之時，清韓人士俱擔心在東洋無有與其對抗之勢力，此誠重要之事。伍還道：俄國戰敗後，歐美諸強國將會派大量陸軍來東洋，並詳加說明各國陸海軍之強弱和派遣運送陸軍之軍艦所產生困難等。伍並充分論述各國反對日本，宣武於東洋之不可能，伍認為結局當為媾和。媾和之際，清國亦應介入此事，若韓國同俄國之條約完全廢止，有關滿洲之清俄條約是否也應當被廢止等等問題，俱有論及。對以上問題，我做了適當之回答。並向其解釋了日韓協約之大意，以及對於日俄戰爭之清國和韓國之不同立場。
>
> 最後，本公使又向其尋問歸任後同慶親王之關係。伍道：已同該親王有過長談。慶王雖為人軟弱，但處事有分，有為人見愛之處。此時，伍之辭任似有同慶王關係改善之苗頭。伍廷芳又力勸慶親王道：對滿洲當要大加改革，其力度不應弱於其他各省等等。以上謹供參考。敬上。
>
> 在清國特命全權公使內田康哉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38]

此次交談的最後，伍廷芳還向內田康哉透露他與慶親王奕劻之關係，有所改善，並稱讚「慶王雖為人軟弱，但處事有分，有為人見愛之處。」

38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伍廷芳的這次談話似乎預示著他的辭官歸隱，將要推遲進行。

七、三訪內田康哉

儘管伍廷芳在同日使的交談中，流露許多對清廷的牢騷與不滿，但是，清廷對伍氏的才能應該說還是比較重視的。自從伍氏自美國公使卸任歸國後，他還牽頭對封建王朝的法律進行改革。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光緒三十二年間（1906），他同沈家本一起設館考求，組織人力翻譯德、法、日、俄各國刑律，經過比較鑒別，伍氏認為日本的法律美備，取泰西各國之長，尤應借鑒。伍氏云：

> 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屢遣人分赴法、英、德諸邦，採取西歐法界精理，輸入東瀛，然後薈萃眾長，編成全典。舉凡訴訟之法，裁判之方，與夫監獄之規則刑制，莫不燦然大備。用能使外國旅居之人，咸願受其約束，而法權得以獨伸。至推原致此之由，實得力於遣員調查居多。我國與日本相距甚近，同洲同文，取資尤易為力，亟應遴派專員前往調查，藉得與彼都人士接洽研求。[39]

伍廷芳係學西方法律出身，他是經過一番認真思考、比較鑒別之後，才建議派人赴日調查其法律制度的。他對日本法律的肯定與讚揚，是與他同日本公使館的密切交往相輔相成的。他愈是信奉日本經驗，愈是同日本在中國的公使加緊聯絡。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1905年2月26日）伍廷芳再度前往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與內田康哉進行密談。此次密談時間甚長，內容豐富，可惜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內田向日本外務省的報告內容，只涉及日本政府最關心的清廷核心機構軍機處之內幕狀況。內田之報告稱：

> 機密第三十九號

39 丁賢俊等編，《伍廷芳集》，上冊，276。

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閣下：

上月二十六日，伍廷芳來訪本使，進行長時間之談話。其中一節談及該國軍機處之內情。其中言道：以前榮祿在世時，軍機處之諸般事務都由其自己全權處理，並不委於諸同僚大臣。榮祿本人將大小政務都面奏皇太后、皇帝，仰其決裁。其他軍機處大臣則淪為備員，在政治上毫無實際權力。但是，慶親王當政時，軍機處情況與前相反。奕劻於政務上沒有自己全權處理之魄力。根據事之不同，往往委派給其他軍機大臣。榮祿在世時，不存在有實權的之軍機大臣，在作為慶親王部下時，或多或少漸得權力。但軍機處內部王文韶、鹿傳霖兩老俱已耳聾，故遇事不能面奏。瞿鴻禨及新進之榮慶兩人利用此好機會屢屢向皇太后進言。由此，瞿、榮二人漸成競爭者，以至互相敵視。去年十二月，榮慶在家臥床養病，瞿鴻禨利用此機會，將榮之姻親陝西巡撫升允，轉為察哈爾都統，其間並無手續。升允被轉為毫無實權之名譽職務，自然心懷怨憤，其後臺榮慶更是憤恨不已，於是苦心經營以挽回局面。幸而鐵良新近從南方歸來，彈劾魏光燾在兩江總督任內時之劣跡。魏被彈劾去職，空出現任閩浙總督之職位。榮慶以此奇貨可居，將升允作為閩浙總督之後任。瞿鴻禨原本欲將升允敬而遠之之舉，反而使其從原任之巡撫直接轉為閩浙總督更為容易。此軍機大臣等之內幕現狀。

另外，高洲翻譯官從二、三清國人處得知，瞿鴻禨、榮慶兩人之反目，實屬因為此事而起意見衝突。又京師大學堂歸學務大臣榮慶、張百熙管轄。該學堂之經費支出須經兩人承認。但近來榮慶對上述經費支出俱不予以承認。使大學堂面臨窮困之途。以至錢櫃中只餘二、三兩之程度。諸般支出停滯，此乃榮慶排擠瞿鴻禨派之親信李希聖（大學堂之庶務調提），欲以己方之人取代之意。該大學堂教習們皆有此傳聞。

又該翻譯官從瞿鴻禨之親信汪康年處得知，兩人反目儘管已成事實，但不至於動搖二人目前之地位。上述情況供參考。

特命全權大使內田康哉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六日[40]

上述情報中所提及的升允（1858~1931），字吉甫，一字素庵，姓多羅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由蔭生考中舉人，曾為總理衙門之章京，後充駐俄國使館參贊。回國後，由布政使遷陝西巡撫。因與榮慶有姻親關係，故特別受關照。

伍廷芳之談話，提供了軍機處的重要人事動向，是供日本政府參考的。但我們則可以從中得到有關清廷中樞機構最真實的描述。

又據張雲樵先生考證，伍氏後來曾短暫離開政壇，南歸上海、廣東。據香港報紙稱：

> 七月二十九日（1906 年 9 月 17 日）《香港華字日報》以〈伍秩庸決意不出山〉為題，該報導說：「伍秩庸前因告假回籍修墓……於閏四月間已由津抵滬，逗留兩月，尚未赴粵。茲悉侍郎近日又以舊病觸發頭痛等詞，再行奏請開去刑部侍郎缺。蒙恩再賞假兩月，勿庸開缺。然說者謂此次假滿後，仍續請，大約決意乞骸骨，不復作出山之想云云。」雖兩宮多次電召，伍秩庸決意不再北上。同年十月十七日（1906 年 12 日 2 日）《華字日報》北京專電：「伍廷芳奏請開缺，奉旨允准。」[41]

據此可知，伍廷芳在三訪內田康哉之後數月，即以「修墓」為名離京南下。此後，與日本公使館的聯繫亦十分稀少。

八、轉向革命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1907年9月23日）清廷命伍廷芳再度充任美、墨、秘、古之出使大臣。伍廷芳對這一任命是樂於接受的，因為他對中國官場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能有機會再次赴美效力，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擺脫困境、施展才能的好機會。同時海內外對伍廷芳能再度

40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41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242。

赴美任事，亦表示歡迎。據張雲樵先生所譯：

> 伍廷芳閣下正準備以中國駐美公使身份前往華盛頓，伍廷芳可說是受美國歡迎的人物（person grata），他對外交有很高的技巧，對國際事務亦有深刻的瞭解，他亦很善於掌理事務，使他成為這個古中國的一個最佳代表。他亦很受美國市民的歡迎，他態度和藹，貴族的舉止，隨機應變及嘹亮的聲線，他在美國十分出名。他受到熱烈的歡迎；作為一個講演者，群眾都聚集聽他的演說；作為一位政治家，一般都認為：「如果中國能出生像伍廷芳這樣的人，這個民族是很有希望了！」作為中國的代表，他保持著與政府及總督接觸，對中國富強之路有很大的影響力，雖然這點很多歐洲政客並不知道。[42]

然而，此時之美洲大陸，革命風潮已日趨高漲，在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鼓動下，許多華僑都踴躍捐輸，購買軍械，支援反清運動。伍廷芳知清廷大勢已去，很難有所展布。伍廷芳二次赴美時日甚短，僅一年又四閱月，即被他人頂替。回國之後，伍氏即辭官居滬上。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又投身於革命陣營，被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代表，為建立共和制度與清廷方面之代表談判辯駁。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由孫中山提議，各省代表通過，伍氏又出任司法總長。爾後，伍氏又對袁世凱等人之倒行逆施，進行頑強抗爭。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在廣州護法軍政府時，伍廷芳又被舉為七個政務總裁之一，兼負外交、政財等要職，歷盡辛勞，全力協助中山先生同各路軍閥腐朽勢力進行抗爭。一九二二年六月伍廷芳在同陳炯明背叛孫中山阻撓北伐的鬥爭中，憂憤成疾，於六月二十三日病逝廣州。

孫中山先生對伍廷芳自辛亥首義之後對中國民主革命之貢獻，予以充分肯定。其祭詞云：

> 維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國人為故總長伍公秩庸於上海設立致祭，孫文謹以素馨清醴，告公陵曰：

42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245。

> 嗚呼！國運逆遭，老成有幾？作賊者誰，迫公於死！昔在六年，群雄毀法，公堅卻署，猶無敢劫。越溯開元，有清違拒，憑公之告，亦免漂杵。嗟彼鴟鴞，獨悖於人，既眊於欲，遂噬其親。國本之摧，梁棟先折，徒法不行，矧今法絕！締造艱難，英俊弗少，曰有典型，皤皤元老。大勳未集，繼以來茲，公為國死，痛乃無期。繫國存亡，藐躬未敢。義之所在，責無能道。我不敢死，公不欲生，願持此志，證之冥冥。嗚呼哀哉！尚饗。[43]

中山先生的祭文聲情並茂，感情真摯，稱伍氏為革命元老、先輩典型，對伍廷芳的歷史功績予以充分肯定，從而也奠定了伍氏革命家的歷史地位。

九、對伍廷芳的歷史評說

儘管孫中山先生對伍廷芳有充分的肯定，然而，對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所藏的有關伍廷芳的歷史文獻，仍應予以正確考評。

其一，首先要說明的是，伍廷芳向日本駐中國外交官各次提供的清政府高層政治情報，不是出於金錢的目的。從目前所見到的史料來看，日本外交人員尚沒有因為伍氏提供了有關清廷上層的情報，而給予金錢報酬。因為伍廷芳在北京的薪水是相當優厚的，比一般清廷官員高出許多倍。伍氏並不缺錢花。當初李鴻章將伍廷芳調入時，曾向清廷奏報有關伍廷芳薪水待遇問題。其文曰：

> 惟聞伍廷芳在香港作大師狀，歲可得萬餘金，若欲留之，亦必厚其薪水。黎道曾微探其意，非每年六千金不可，為數似覺太多。然留之俾為我用，鈞署及各口有事，均可令其前往襄辦；無事則令在津學說官話，與通曉漢文者翻譯西例。若能辨正一事，有俾大局，所值當不止數千金。現在日本外務省延雇美國律師，即前充天津領事之施博威，歲費萬金，想亦有見於此。伍廷芳究係中國人，與雇西

43 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1），312。

> 人有間，且勿庸訂明年分，寫立合同，進退綽有餘裕。
>
> 查中國通曉西律，尚未有人，無從翻譯。前派學生出洋學習，每歲費且詎萬。如令將西律譯出，則通曉政體、見解敏捷之人，一覽自能了然，從此西律人人能通，而西人亦無從欺蔽，於辦理交涉案件，不無裨益。即將來擬訂中外通商律例，亦藉有援據參考矣。如承允許，其薪水一切，當會商南洋籌款給發。[44]

可見，伍廷芳的薪水是高過京師官僚許多倍的，不存在缺錢的問題。伍廷芳之所以屢屢將清廷上層之政治情報輸於日本，是因為他自天津條約談判以來，所建立的對日本的好感與友誼。

伍廷芳的這種好感有其原因。作為一個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對清王朝的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及種種歪風邪氣，開始時格格不入，繼而又非常憎惡；相比之下，對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所採取西方的議會民主之體制與司法制度，心嚮往之。因此，出於對日本的好感，他不顧客觀條件，希望同日本結盟，希望日本多向中國派專家指導等等。總之，伍氏是出於對日本的友誼，才心甘情願地向日方提供情報。

其二，伍廷芳在甲午戰爭後同日本領事及公使的交往，往往受李鴻章主和外交的影響，有些是直接受李鴻章的指使而為的。

甲午戰爭初期，李鴻章不認真備戰，企圖借助俄國等列強干涉，避免與日衝突，因而受到親政不久、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屢次申斥，帝黨勢力迅速膨脹。李鴻章和伍廷芳、羅豐祿等北洋官僚處於政治上被壓抑的狀態。因此，對光緒皇帝及翁同龢等帝黨官僚的憤恨情緒，瀰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積愈深。最後，清軍一敗塗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讓李鴻章和他的兩個親密幕僚，當時的外交專家羅豐祿、伍廷芳一起來到日本議和。可想而知，李鴻章等人是帶著滿腹的牢騷來到馬關談判的。

李鴻章在談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個中外皆知的和平主義者。當戰爭初起，他曾力圖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戰派硬是要打這場戰爭。李鴻章在談判桌上同戰場上的敵人做這樣的表白，目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擺脫干係，把戰爭的責任推到以光緒

44 丁賢俊等編，《伍廷芳集》，上冊，2。

皇帝為代表的主戰派身上？李鴻章們在馬關談判時，作為戰敗國的代表處境是非常困難的，可是，作為清朝的談判使者，講這些話是很不合時宜的。這就是為什麼當時的日本檔案文獻中，凡有李鴻章處，均稱之為「李伯」，稱伊藤博文為「伊藤伯」；還有一本史書把李鴻章來馬關與伊藤博文之會談稱為「雙雄會」，即不管失敗還是勝利，都是英雄。這是李鴻章給當時日本社會的印象。正如荒川巳次領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國力，戰後對日尤為敬慕。李鴻章認為戰爭之結果，恰恰證實了他戰前的預見，故自內心對帝黨人物更加鄙視，因而與日本外交人員產生共鳴。

受李鴻章之影響，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表功，為了儘快兌現在馬關簽署的條約，是他本人親自頂著翁同龢的壓力，去做軍機大臣內部主和派孫毓汶、徐用儀的工作，由他們再疏通恭親王，從而說動位處深宮的慈禧，然後再強迫光緒皇帝含淚在《馬關條約》上用寶。這是一幅何等淒慘的宮廷歷史圖畫。它與日本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敵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顯明的對照。

正是因為李鴻章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伍廷芳、羅豐祿回到天津以後，就頻頻同荒川巳次領事密談，一面散佈悲觀情緒，一面加強與日人聯絡，他們還居然幻想與日人合作，共同恢復李鴻章失去的權力，伍廷芳對荒川說「今後李伯倘有所為，實彼我之幸福，兩國之大利也。」[45] 清朝作為一個被日本侵略的弱國，怎麼可能與之有共同的「幸福」，共同的「大利」，實在是與虎謀皮，異想天開。正如荒川所指出的，伍廷芳、羅豐祿「雖然說為李伯考慮，實際上也為他自己打算。」這種評論可謂一針見血。

李鴻章、羅豐祿、伍廷芳，這些晚清的外交專家們把朝廷內部的對立情緒，帶到了談判桌上，以至於同戰場上的敵人站到了一起，共同對付朝廷，對付朝廷內部的政敵，北洋的精英們完全站錯了位置。伍廷芳在這個階段屢次向日人輸送情報，其根源就在於此。伍氏在很大程度上是稟承清廷上層慈禧、李鴻章等主和派的旨意行事的。

45 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614~618。

其三，日本機密檔案中有關伍廷芳的史料，並非全部是輸送情報性質，有的則是正常的外交公務、討價還價的記錄。而且，李鴻章、伍廷芳雖然有上述那種不正當的情緒在內，但是，他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譬如減少賠款割地等，還是在努力爭取減少損失。這裏不妨也舉出一個例子。林董公使曾於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向外務大臣西園寺報告稱：

外務大臣臨時代理侯爵　西園寺公望閣下：

正如九月九日機密第四十一號電報所提及那樣，在李鴻章達到北京以後，伍廷芳為了探望本使的病，到本館來了幾次，而且談了很長時間。其實，他是受到李鴻章的私下指示，想在本使的思想中注入李鴻章的希望而來的。這個事實很明顯。其主旨是：關於遼東的處理，不能支付大數額的金錢，不過作為報酬，給予別的什麼沒問題。而且清國越增加開放口岸越得到利益，這同允許日本人敷設鐵路一樣，所以考慮這些因素，只要能找到代替金錢辦法的話，那麼對雙方來說都有益。他說，即使是在北京開口岸，對清國來說毫無危害，更申述這件事是使清廷從頑夢中醒悟過來的捷徑。在充分表達了內心意見之後，他請求告知伊藤侯，能夠按照李鴻章的想法決定遼東問題。這件事是和前幾天在第四十五號電報裏申述一樣的。

關於清廷能付款數額的事，雖然伍氏對本使沒有說過什麼，但好像他對英公使說過：清國可以付款一千五百萬兩乃至二千萬兩。何以知之呢？因為英公使訪問本使之時，也說對遼東問題快點決定是上策。並轉告清國已拒絕了三國提出的三千萬兩的賠款請求，而且申述，他關於清國是不是賠一千五百萬兩乃至二千萬兩的事，雖然沒有特別可靠的根據，但是確信清國一定會承諾。次日伍廷芳又來訪本館，所以本使突然問他：本使自英國公使「私下地（confidentially）」聽了這樣的傳聞，足下有沒有聽過它？伍氏表示了吃驚的臉色，申述：英公使已經告訴閣下了嗎？推測伍氏的樣子、聲音，及其訪問英公使的時日等等，十有八九無疑。伍氏暗中使英公使向本使轉達之後，又親自來補充英公使對本使談論不足的地方。果然，他沒有

忘了本身的地位而對這樣重大的事件發言。因此，毫無疑問，他一定是按照李鴻章的秘密指令發言的。可想而知，如果清廷只依賴俄、法，就沒有理由急於同我方直接商談，因為聽任俄、法而等待其結果是很適當的。相反，清國急於同我直接談判的理由是：為報答俄國的周旋，答應借款籌集要求的話，俄國會把這件事看做報酬範圍之外的人情，又將有更進一步的所求等等。

我認為，因為察覺到報答而產生新義務的將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儘量地躲避俄國的干涉而謀求問題的解決。李提出把朝鮮放置在各國共同保護下的理由也是：他認為比日本獨佔朝鮮之事更可怕的，是俄國企圖獲得滿洲地方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這件事伍廷芳談得很清楚。伍廷芳和英公使都由於深入事態的連鎖反應，他們的談話好像為了給本使提供形成意見的依據，所以本使難以斷言這些看法是否就是李鴻章本人的意見。但是參照首尾顛末而列出要點，還可以說是和前幾天在四十二號電報裏申述的內容一樣的，謹舉出上面之事供參考。敬具。

特命全權公使 林董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46]

這個例子說明，李鴻章、伍廷芳在當時的對外交涉中，也在力圖減少賠款，縮小損失而努力爭取。因此，對日本機密檔案中涉及伍廷芳之密報，應根據當時情況，作具體分析，不可將伍廷芳與日本公使的所有談話一概視作情報。

其四，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力求全面。

伍廷芳的事例在近代中國很具有典型性。他的曲折經歷反映了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回國服務時的複雜心情。在國外時，他曾有改造國家、奮發圖強的雄心壯志。但是回國後，面臨閉目塞聽、頑固守舊的封建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壓抑，他感到無計可施，灰心失望。這種情緒自然會反映到他對日本的態度。

伍廷芳羨慕遠比清朝封建制度優越的日本的政治制度，及其蒸蒸日

46 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626。譯者大橋義武。

上的國力，從而產生了相信日本、依賴日本的感情。將他所知道的政治情報源源不斷地傳達給日本外交人員，以取得他們的信任與好感。伍廷芳也許不太清楚這些情報的價值，而日本的外交人員卻對此十分珍重。因此，他們在收到情報後，便原原本本地向外務省的主要領導稟報，而外務大臣則往往把伍氏提供的密報再轉呈給日本總理大臣，逐級呈報，認真研究。對日本檔案中所保存的有關伍廷芳的這些文獻，是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應予以注意的。

評價歷史人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每個歷史人物幾乎都是紛繁複雜的，有光彩的一面，也有陰暗消極的一面，因此不應該只是看到他「正義凜然的人格和藹然沖挹的風儀」，而忽略其消極的一面，把伍廷芳說得完美無瑕。

再有，歷史學家不可能在研究該人物時，掌握其全部資料，因此，對歷史人物的判斷評論一定要留有餘地，不可以說過頭的話。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以一眚而掩大德，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片面代替全部。日本外交檔案中的有關伍廷芳的記載，不應該也不能夠掩蓋了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那光彩奪目的一面。因此我們不能夠因為日本外務省檔案史料的發現，而否定伍廷芳在辛亥革命時的歷史功績。

（責任編輯：王超然　校對：盧意寧　陳聖屏）

Wu Tingfang as Seen through the Japanese Secret Archives

Kong, Xiang-ji & Murata Yujiro*

Abstract

Wu Tingfang was a very famous diplomat in late Qing, was also one of pioneers seeking truth from the West. Earlier studies on him neglected Wu'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records in the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and reveals one important aspect which so far not known to the public.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being the first attaché in the Chinese Negotiation Delegation, Wu began to have frequent contacts with the Japanese. Later Wu returned to China and paid visits to the Japanese Consulate-general in Tianjin, Kiji Arakawa, and the Minister, Tadasu Hayashi, many times, and reported to them about situation of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the different cliques in the high level of the Qing bureaucracy. He also provided some information on the Qing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peace. Wu also showed pessimism towards the future of China, thought China would split up and be eventually destroyed. Wu sought the help of post-War victorious Japan to restore Li Hongzhang's power and status lost during the War. Wu even claimed publicly that if Li should regain his power, it would have "great happiness and benefits for both of our two countries."

Wu was later appointed as the Minis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he returned, again he revealed to the Japanese Minister Yasuya Uchida on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Russia faction in the Qing Court and Lian Fang was a leader. He reported the precarious situation of the Guangxu Emperor. He also attempted to persuade the Japanese Minister and his wife to put in a good word for him in front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elevate Wu into high position…

* Kong, Xiang-ji, Associates in Research,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Murata Yujiro, Associate Professor, Area Studies in Komaba, The Univerisity of Tokyo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Area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as revealed in the Japanese archives is well known today. But at that time the Japanese diplomats took it very seriously. They carefully sorted out and systematically presented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turn, the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presented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to the Premier of Japan.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reasons behind Wu's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the Japanese. It was mainly because Wu was influenced by Li Hongzhang's policies, and Wu's abhorrence toward the Chinese feudalistic system, together with his impractical fascination towards Japan. This article unearths those almost unheard-of materials from the Japanese secret archives, in the hope that, rather than denying Wu'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but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this important figure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Wu Tingfang, diplomacy,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revolutionist, Kiji Arakawa, Yasuya Uchida, Tadasu Hayasi